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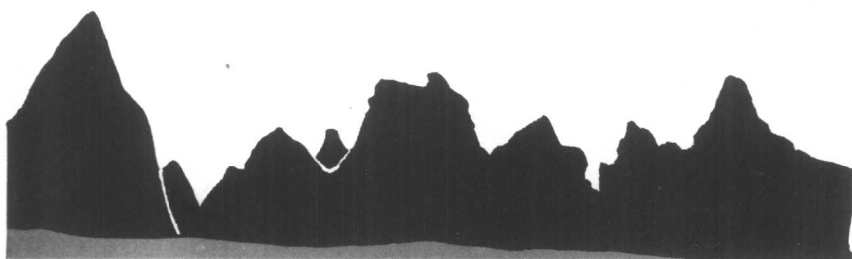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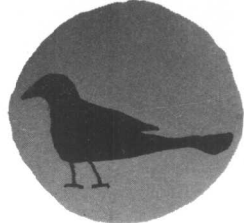


魯凡之著

論中國

神州
巨變





魯凡之著

神州 巨變 論中國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書名：論中國——神州巨變

作者：魯凡之

出版：廣角鏡出版社

香港灣仔莊士頓道195-197號八樓 電話：5-753877

發行：革風書局

香港灣仔莊士頓道184號-186號 電話：5-749495

承印：太古印刷公司

版次：1984年2月版

定價：港幣50元

書號：ISBN 962-226-053-5

序：鳳凰涅槃，文化再生

神州の古老大地在顫動，中華民族的巨龍仍在掙扎；我們的中國實在太古老了！在舉世芸芸衆多古文化系統之中，中國幾乎已是碩果僅存的文化古今同一體（當然，這範疇只能相對而言）；古埃及帝國的皇朝早被埋葬在沙漠之下，巴比倫的花園僅餘斷瓦殘垣，古印度的達羅毗荼人只能在《吠陀經》裏找尋……，但我們的中國，却飽經劫難，歷盡滄桑，數千年來沉一綫，血族繁衍而成全人類的四分之一，至今仍承傳着那原生文化體的深根主幹。無可置疑，這樣的事實向我們說明，中華民族有着驚人強韌而豐盛的生命力，這是中國能夠存在數千年並能取得進步的根本原因；但同樣的事實亦向我們揭示，中華民族有着驚人現實而適應的保守力，這却是中國數千年來爲甚麼進步那麼緩慢而迂迴的內在因由。

然而，中國雖古，頑力雖大，但中國人的生命主流畢竟是傾向進步的；要進步便必須要變革，必須要與各種各樣的頑力作鬥爭。孟子有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古老的中國已在近世那百年大變局的「火浴」中走向「再生」！在火浴中再生的神州，是謂「鳳凰」！中國必將獲得新的文化生命，中國必將發生掀動整體文化結構、掀動民族靈魂的「維新」，而這「不斷維新」的過程，又積累爲一個真正的中國文化大改造——觸動到中國數千年文化原生體的組合運作原理——「文化原型」的變革。

這本書與我已出版的另外一本書：《國情國議——論當代中國問題》，是互爲補充的，不同的是，本書集中討論了《國

情國議)所較少討論的農村問題,以及整體性的文化結構問題;所謂農村問題是中國問題的根本,這句老話在當代中國是仍然確切的,所以本書用了比較大的篇幅去討論由傳統到現代的中國土地關係變遷、土地改革、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當前正在推展中的以聯產責任制(所謂「雙包」或「大包乾」等)及農村專業公司為重心的農村生產關係結構改革,以及這種農村經濟改革與整體經濟結構以至中國文化結構改革、中國式社會主義發展前景之間的基本關係。

魯凡之序於香港

一九八三年八月

獻給玉芯——當這本書準備出版之際，
正是我精神上最苦困的時候，
是你給了我全面的支持，
使我的生命走上了新階段！

目 錄

導論 要從文化結構角度探索問題

第一章 中國文化與「維新模式」	3
第1節 「歷史的妥協」特質與「維新模式」	3
第2節 血緣網絡強化與「血緣臍帶保留」	7
第3節 「古今同一文化體」與「反饋模式」	10
第4節 文化結構改造與「其命維新」	17

上篇 農村問題是中國問題的根本

第二章 中國的「後毛澤東時代」開端	27
第5節 所謂「後毛澤東時代」的範疇說明	27
第6節 「經濟新路子」與「打破大鍋飯」	32
第7節 「毛澤東式」經濟體制、陳雲「國力論」 與文化結構	38
第8節 從「粗放成長」到「密集成長」——走向 「理性社會」的「小鍋／大鍋綜合體制」	42
第三章 「血緣臍帶」與傳統中國文化	51
第9節 「血緣臍帶保留」與傳統中國文化變遷	51
第10節 「血緣臍帶保留」與傳統中國土地關係	57
第11節 「血緣臍帶模擬」與傳統中央國家功能	67
第12節 中國中央國家的傳統「集產／均產功能」 (上)	76
——「皇朝／農民戰爭循環」與有關功能之「靈活 模鑄幅度」	
第13節 中國中央國家的傳統「集產／均產功能」 (中)	82
——「皇朝典範」與「農民戰爭典範」	

第14節	中國中央國家的傳統「集產／均產功能」 (下)	90
	——從「限民名田」、「國有均田」到「現行社會主義」	
第四章	從「分田」到「合田」	105
	——土地改革與農業集體化	
第15節	最後的「皇朝／農民戰爭循環」周期(上)	107
	——由清初「康乾之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第16節	最後的「皇朝／農民戰爭循環」周期(下)	113
	——中共領導的農民戰爭及土地改革運動	
第17節	土地私有的「歷史兩難」與傳統「循環」 的終結	121
第18節	中國農業集體化的三大歷史功能	128
第五章	人民公社平議與土地經營權的「第二次土 改」	143
第19節	建國以來農村土地關係的「合」→「分」 →「合」——大循環總論	143
第20節	合作社→人民公社→生產隊的「適度組織 規模」摸索	147
第21節	人民公社的正負功能檢討	159
第22節	從聯產責任制到農村企業公司(上)	169
	——關於「大包乾」的性質論爭	
第23節	從聯產責任制到農村企業公司(中)	181
	——「大包乾」的「公私合營」性質與農村「混合經濟」	
第24節	從聯產責任制到農村企業公司(下)	193
	——「多層次結構」與中國農村出路	
下篇	「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探尋	
第六章	中國國情特殊性與當代危機	211
第25節	中國文化特殊性與國情特徵	214

第26節	「全權國家」與「中央黨國全權制」	220
第27節	「文革」的文化結構反省與當代中國危機...	228
第七章	「大同世界」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241
第28節	「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上）.....	241
	——關於「何謂社會主義」的理論探討	
第29節	「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中）.....	252
	——從「中央黨國全權制」到分權化「混合結構」	
第30節	「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下）.....	272
	——中國式社會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大同」	
後記：中國知識分子與「維新」變革		

導論

要從文化結構角度
探索問題

第一章

中國文化與「維新模式」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①

《詩經》的這句話，說的雖然具體地是指我國三千多年前的周族，但在整個中華民族及中華文化的成長過程中，古周族文化曾經在一個相當長的階段裏扮演了主導性的角色，以至周文化的很多重要特徵，早已深刻地成為了中華文化有機體的重要構成部分；兼且，在周之前便作為黃河流域中游文化主體的夏族，與周族之間，亦存在著密切的血緣及文化關係，而從現代的文化考古學角度來看，周文化與夏文化，均可追溯到所謂「仰韶文化」（估計約距今七千年以上）的共同「原型」（Proto-type）。

第一節「歷史的妥協」特質與「維新模式」

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侯外廬，當他研究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時，曾提出過一個非常精闢的見解，他寫道：

「（西方式）『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徑，（東方式）『亞細亞的古代』却是改良的路徑；前者便是所謂『正常發育』的文明『小孩』，後者是所謂『早熟』的文明『小孩』，用中國古文獻的話來說，便是『人惟求舊、器惟求新』的『其命維新』……。」^②

侯外廬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若干觀點（例如將之介定

爲奴隸社會範疇，等等），我雖則有著多方面的質疑，但對於上引的那段話，却覺得對於探討中國「文化結構」某些貫串古今的重大特質，實有著一針見血的啟發性；包括中國古代在內的所謂「亞細亞的古代」，其主要文化特徵之一，正在於「改良的路徑」，而這路徑則又包括著兩大方面——「早熟性」（或辯証地即「遲熟性」）與「維新性」。

在某種分析角度之下，「其命維新」已不僅只是古周族的文化特徵，而且是整個中華文化至低限度在古代階段的特徵。在特定的層面上，文化意義的「早熟性」／「遲熟性」與「維新性」是有機地相互關連的——一方面，所謂「早熟性」只是一種相對的概念，而且往往要與「遲熟性」的「難產」，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而成為辯証統一的範疇；「早熟」意味著某些突破性因子於未具備充分條件的情況下，便已不完備地誕生，因而這種誕生在「充分」的意義上說便是「難產」，並反過來構成「充分誕生」的障礙，於是文化「早熟性」在另一角度看來，卻又顯現爲文化「遲熟性」。另一方面，正因為中國文化有著「早熟性」與「遲熟性」並存的結構特徵，某種所謂「新世界已經誕生（但却長期不能充份誕生），舊世界正在死亡（但又長期不能徹底死亡）」的畫像，便成為中國文化的典型寫照；在這種文化特徵主導之下，「歷史的妥協」（Historical Compromise）可說是中國式「歷史組合」（Historical Bloc）③的必然——也就是說，中國文化④至低限度在其古代結構裏，既非西方式的相對直綫型「大動態」（侯外廬所謂「革命的路徑」），亦非印度式的相對不變型「大靜態」，而是某種靜中帶動、寓動於靜的相對曲綫型「維新」（侯外廬所謂「改良的路徑」）。

從黑格爾開始，西方理論便一直對中國存在著一種誤解（即使馬克思那未成熟的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亦顯然沒有擺脫這種誤解——或文化視點偏差），即認為自古以來中國是一種「無歷史狀態」⑤或一種「靜止」⑥；然而，實際上中國却是全世界最重視歷史的民族，雖則中國並不類似西方的直綫型「革命模式」，但也絕非沒

有發展的「停滯模式」——由於「早熟性」與「遲熟性」並存而形成的「歷史的妥協」文化型格，遂使「死的拖著活的」或「活的衝著死的」又聯合又鬥爭的迂迴式緩進發展，很早便成了主導著中國文化結構的某種曲綫型「維新模式」。「維新」也者，就是在妥協中求改革，均衡中求緩進；正因為發展的路徑迂迴而速度緩慢，故中國文化又由此而派生出如下的若干重要特徵：

(一). 講求整體兼顧的均衡發展，從而形成在所謂「和為貴」價值取向、以妥協形式處理矛盾鬥爭的文化常態；

(二). 由於均衡發展在常態中取得主導地位，穩定的人際關係及與此直接相關的保守性倫理道德／意識形態，便成為中國文化常態的重要組成；

(三). 因此，保守勢力在中國文化結構裏總是特別巨大，新生勢力一則誕生困難，另則形成後亦往往只能通過保守勢力的內部矛盾間隙，「統一戰綫式」地求取某種妥協性的變革——「維新」契機；

(四). 因為「維新」通常一開始便帶著「統一戰綫」的性質（必須理解，所謂「統一戰綫」的運作形態，在中國實與文化本質直接相通，也就是「活的」與「死的」又聯合又鬥爭的「歷史的妥協」），而「霸權」（Hegemony）^⑦爭奪的結果，又經常導致保守勢力不同程度的恢復——不僅變革力太弱可能導致這點，而且變革力太猛也可能導致這點，於是便出現那經常在中國反反覆覆的迂迴式曲綫；

(五). 由於發展的路徑迂迴，速度緩慢，中國文化在追求均衡性發展之中，又往往能顯現出較強的吸納消化外來因子能力（即所謂兼容並蓄性），以及在這種文化「表癥」背後的強韌主體性（所謂「舊邦」，但却能「器惟求新」）。

總的來說，某種相對的「靜態」（但不是「靜止」、「停滯」），確實是中國文化結構由古迄今的一種主導形態；但中國式的「靜態」，却是某種蘊含著相當程度「動因」的「靜態」，而這「動因」又經常顯現為力有不足，於是便只能走「維新」的「改良路徑」，而不能走

西方文化那種「大動態」的「革命路徑」。作為中國文化的整體性形態特徵之一，可說正在於這種結合著「小動態」的「靜態」，或「靜態」主導下的「小動態」（我曾稱此文化模式為「陰主陽動型」，「陰」者即「靜態」也）；中國文化結構不是不能變，不是不能改，而是不能變得太快或改得太急，所謂欲速則不達，過急可能導致更強烈的本質保守（「文革」的歷史教訓，實在應該作出文化結構性質的深刻分析）。

當然，在中國式均衡發展的迂迴「循環」裏，一方面，新循環並不能說是舊循環的簡單重覆，另方面，在每一循環的某些階段上，出現相當時期的「停滯」以至「倒退」，則却是完全可能的（即使在西方文化的「動態」模式裏，也曾出現過長期「停滯」的中世紀「黑暗時代」）；此等階段性及迂迴性的現象，乃根源於中國的文化「早熟性」與「遲熟性」並存型格，某些西方學者——例如當代美國著名的「漢學家」埃爾文（Mark Elvin），便曾稱中國文化裏存在著某種所謂「高層面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⑧，在我看來，實質上指的便是各種較高層次意義的「循環」裏的「停滯」階段而言。

但總的來說，中國文化是一種可作緩進變革的「維新模式」文化，雖則在其結構內涵裏，並不缺乏足以導致相當嚴重「停滯」的「文化陷阱」——討論到這裏，我們便必須再提出如下的問題：

(一). 中國文化結構的「維新模式」特徵，既然來自中國那文化「早熟性」與「遲熟性」並存的性質；那麼，這所謂文化「早熟性」與「遲熟性」又從何而來？以及這兩個範疇所主要指的內容，究竟是什麼？

(二). 在(一). 裏所述的中國文化結構特質，是否由古迄今都基本保存著的呢？若是，則此等文化特質得以延傳數千年的主要途徑是什麼？

(三). 時至今日，即使經歷了近世那百多年所謂「二千餘年一大變局」的劇變，但假如作為中國文化結構特質之一的「維新模式」仍然沒有質變的話，那麼今天中國的結構改革出路，又與這種「維新模式」之

間的關係在那裏呢？

這三個問題，可說對不管從歷史角度還是現狀角度探討中國問題者，都有著根本的意義；我覺得，今後中國要探尋「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要為中國變革的實踐而創建結合中國文化特質的變革理論（包括「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亦屬於這種中國式變革理論的範疇之內），這三個問題都是必須要作詳細研究的。在這裏，我就此先作一些扼要的討論。

第二節 血緣網絡強化與「血緣臍帶保留」

(一). 所謂「早熟性」也好或是「遲熟性」也好，實際上。不過是同一種性質發展之二面，或對同一種發展形態的不同角度觀察——不管那一個民族和那一個文化，兩性關係和血緣關係都是人類最原始的人與人之間關係，難免經過複雜而巨大的變化，但直至今天，基於兩性關係及血緣關係（例如親子關係）的組織單位和組合模式，仍是地球上一切人類社會的組織「細胞」和運作原理基礎之一；然而，某一血族羣體的原始性血緣關係網絡的解體過程，同時也就是立足於地緣關係及功能分工關係之上的社會成長過程，換句話說，原始性血緣關係（及有機地緊密連繫在一起的兩性關係）——例如氏族關係的解體，便意味著人類最古老的「舊世界死亡」，而在此基礎上按照人際關係功能分工發展而自然形成的新組合——例如「財權」（私產）、「政權」（國家）、「教權」（意識形態團體）、「民權」（個體人的覺醒）……等等，以及它們之間有機關係的形成、演變和超越，則意味著人類成長過程中的「新世界誕生」。

中國文化的相對特殊情況是，它的原始性血緣關係網絡特別強固——至於這種強固性的由來，則可能與華夏部族祖先在黃河中游流域定居時，由畜牧經濟轉入農業經濟而成功地對「水的挑戰」作出了回應有關；「治水」等較大型公共工程在遠古的低度技術條件下，唯有訴之於「矇昧集體主義」的簡單協作，方可能實現，於是，與「矇

昧集體主義」交織在一起的原始性「血緣臍帶」，以及在這「臍帶」中扮演核心角式的血緣長老權威——這種「權威」有兩大特色：第一，那是一種自然權威，第二，那是一種基本上不作功能區分的「全權」（Total Power）式權威，便從組織運作到意識形態都得特殊的強化發展。當然，除了由於「治水文化」（Hydraulic Culture）^⑨的特殊性之外，肯定還存在著更多的其他促成因素，以後我將會作詳細的討論；在這裏，可以確定的是：血緣集體關係網絡或所謂「血緣臍帶」特殊強固，確實是中國文化結構深刻地烙到了「原型」層次的重大特徵。就這一要點言，西方的好些大社會學家都是看到了的，例如馬克思在討論「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時，就曾提出了「氏族關係保留」^⑩的觀點，韋伯（Max Weber）也曾就宏觀的角度，指出「中國的氏族團體的權力，則屹然未經破壞」^⑪，等等；而氏族關係的「保留」或有關權力的「未經破壞」，可說正由於我在前面所提的「血緣臍帶」特殊強固。

顯然，原始性血緣關係網絡的「保留」及「未經破壞」，也就是人類最古老形態的「舊世界」仍然活著，這種分析角度，實是走向打開中國文化之謎的一條重要鎖匙；但與此同時，我們却必須注意到，在中國，這個仍活著的古老世界並非原封不動地「活著」，所謂「保留」及「未經破壞」亦只能相對而言——事實上，中國文化結構也像其他發展形態的文化結構一樣，由於技術進步、生產力提高、戰爭需要、功能分工發展、意識形態成長……等等的文化因子變動，早就開始了在結構意義上促成氏族關係解體的進程。但又由於「血緣臍帶」在中國文化「原型」裏的特殊強固性，以至這種氏族關係解體進行得比較緩慢及不徹底；於是，便出現了「血緣臍帶」始終佔著主導的種種非血緣性新人際關係發展，即「新世界」與「舊世界」既聯合又鬥爭的「歷史的妥協」，例如——深刻地交織著血緣關係網絡而內在地有著「全權導向」（即政教財權合一傾向）的國家政權，或始終處於國家政權及血緣族權支配之下而不能充份發展的私產財權，以至實質

作為血緣集體關係價值提昇的「拜人教」意識形態教權，及受盡「血緣臍帶」束縛的個體民權長期「難產」……等等，可說都是數千年來傳統中國文化結構的常態（雖則春秋戰國之後，氏族關係支配的局面已基本終結，但却又轉入可視之為「次氏族關係」的家族關係支配局面，以迄近代，中國文化始終帶著未能切斷「血緣臍帶」束縛的性質）。

正是從「血緣臍帶」數千年來「保留」的角度看——即在中國文化裏的常態或主導形態下，個體雖則已從作為「母體」的血緣集體裏誕生出來，但又始終對血緣集體存在著難分難解的依附關係而未能「充份誕生」；又或種種功能分工關係及地緣關係，雖則已從作為「母體」的血緣關係網絡裏誕生出來，但亦同樣始終受著血緣關係網絡的支配而未能「充份誕生」……，凡此等等，即我所謂「血緣臍帶保留」之文化現象，也可說是中國文化「遲熟性」一面的所在；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在「血緣臍帶保留」的情況下，中國却已老早便萌生了一定程度明顯的功能分工關係及地緣關係發展（雖則未能「充份誕生」），故同一種發展形態則又可視之為中國文化「早熟性」一面的所在。總的來說，中國文化結構這種「早熟性」與「遲熟性」並存的特殊狀態，大體上可概括地描繪為如下的一幅圖畫：

血緣的舊世界正在死亡，但又數千年來不能徹底死亡；地緣的、功能的、「人」的新世界早已誕生（不要忘記，中國文化是舉世最早萌生的「人文主義文化」），但却數千年來不能充份誕生（同樣不要忘記，中國那以「拜人教」為意識形態本質的「傳統人文主義文化」，也正是舉世最窒息「個體人」／個性解放的「抽象人崇拜」——「中國式異化」）。

所謂「抽象人崇拜」亦即「血緣臍帶崇拜」（這是中國文化由「人文主義早熟」而導致「人文主義難產」的秘密所在之一），正由於「血緣臍帶保留」（往往在整體層次顯現為「全權導向」的國家政權，或更在個別層次直接顯現為族權、家長／長老權，等等）的支配作用，中國文化結構裏因技術進步、生產力提高、戰爭需要、功能分工發展、